

ZHONGGUO YU
ELUOSI YUANDONG

中国与 俄罗斯远东

维·拉·拉林 / 著 张宗海 / 译 陈本戟 / 校

中国与 俄罗斯远东

维·拉·拉林 / 著 张宗海 / 译 陈本戟 / 校

译者序言

1998 年底，俄罗斯科学院远东分院历史、考古和民族学研究所所长拉林教授在符拉迪沃斯托克（即海参崴）出版了一本名为《90 年代上半期的中国与俄罗斯远东：地区合作问题》的学术著作。全书所述七章（中国的前途，透过相互的利益和矛盾看俄中关系，俄罗斯远东处于对华政策的焦点，中国人的流徙，相互关系问题，边界，如何制定对华政策）都是俄罗斯媒体和部分学者在 20 世纪 90 年代上半期大肆炒作的问题。

在 20 世纪 90 年代的上半期，俄罗斯的媒体和某些学人以不等价的边境贸易、有利于中国人的边界划分、大量中国人涌入俄罗斯、“远东人对北京的秘密意图产生怀疑”等为题，掀起了一场与中俄高层建立的战略伙伴关系极不和谐的反华宣传战。

从 1992 年中期开始，俄罗斯中央、远东和西伯利亚的一些报刊上出现越来越多的关于中国在向俄罗斯扩张、并对俄罗斯构成威胁之类的文章，根据拉林教授的研究和大略统计，仅 3 年间，见诸俄罗斯各类报刊的此类文章就有 150 篇之多，如《伟大的兄弟把手伸向了我們》、《中国人在远东是客人还是主人？》、《黄色浪潮》、《中国人没有武器，但很危险》、《符拉迪沃斯托克是否要成为哈尔滨的卫星城？》、《若是你欺骗我，那么我就宰了你》。只要看一下题目，便可知这些文章在鼓吹对中国和中国人的敌视方面，多么具有煽动性。

1996 年，在符拉迪沃斯托克出版了一本由该市行政长官 K. 托尔斯托沙因作序、名曰“黄祸”的书。此书汇集了 20 世纪初年和苏联政权初期，梅尔库洛夫和阿尔谢尼耶夫两位先生就俄罗斯远东地区的“黄祸”问题向沙皇政府和苏联共产党（布尔什维克）远东边区委员会的书面报告。该书还附有多幅中国人近年赴俄或返国过境以及在俄罗斯活动的照片。且不说该书的内

容，单就这些图片的取材就已很伤中国人的感情了。

拉林教授在他的书中对这场反华宣传战所涉及的问题，完全站在一个俄罗斯学者的立场上。用1999年5月7日《俄罗斯明天报》所载《二乘二等于四，如果再想想呢？》一文的说法，“作者的立场既非亲纳兹德拉坚科的，也非反纳兹德拉坚科的。作者的立场是学者的立场，他担心地方和联邦各级官员企图利用至关重要的与中国的相互关系问题来解决自己一些小的政治问题”。

拉林教授通过自己的研究得出这样的结论：关于中国向俄罗斯进行经济和人口扩张这一说法，与俄罗斯媒体的许多投机行为和某些学人的附会相反，在90年代初，中国对远东并不构成什么政治、社会和经济威胁。中国在俄罗斯远东地区的人口总数和比例比在美国、澳大利亚和欧洲方面的中国人数量和所占比例要少得多，更不用说东南亚诸国了。但他又警告说：今天没有威胁并不意味着明天不存在威胁。对于居民和政治家来说，必须牢记相邻的中国东北地区与远东地区在人口数量、密度上的巨大的不平衡；牢记中国内部巨大的人口压力；牢记中国对俄罗斯部分领土的要求；牢记中国对自然资源的需求以及冲向日本海的决心。所有这些因素综合起来，就会使中国在北部方向积极活动的政策由可能性完全变成现实。无论什么样的“战略伙伴”协定，都不能阻止它。

拉林教授还在该书中“客观地分析了17世纪至今俄中边界确定的整个历史，包括那场支持滨海边疆区行政长官纳兹德拉坚科的名为‘俄罗斯的土地我们寸土不让！’的宣传运动”。

尽管拉林教授是站在俄罗斯立场上发表上述看法的，但是他还是被纳兹德拉坚科告上法庭；这本印数只有500册的著作也被封禁。

译者不揣浅陋，将这本著作译出。步平、赵立枝两位先生审读了译稿，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的硕士研究生云继洲先生翻译了本书的全部注释。陈本裁先生的审校不仅使译者深受教益，而且使这本译作增色不少。作为本书附录的几份中俄双方签订的文件，由于中方没有公布，故没有译出。今年8月底，拉林教授在访问东三省社会科学院之际，曾当面向译者再三表示：本书原文的个别地方需要修改，有的段落甚至要求译者在译文中删掉。为了保持原书的完整并尊重作者的意见，译者将作者要求删掉的

译者序言

段落特在书中注明。译者衷心希望，这本译作付梓以后，对于研究中俄关系和俄罗斯远东地区政治、社会、经贸等问题的同志能有所参考。敬请读者对翻译中的谬误不吝赐教。

最后，需要强调指出的是，拉林教授在书中的许多观点，是站在俄罗斯立场上的，我们对此是不能同意的，希望读者在研究引用时予以甄别。

译者

2002年8月于哈尔滨

前 言

对于俄罗斯来说，在东亚是否还有哪个国家比中国更有重要意义呢？恐怕很少有人肯定地回答说有。4000 多公里共同边界——这是无可争辩的、最具说服力的论据。

更具有说服力的是，“中央国家”经过一百年的中断、停顿之后，现在正满怀信心地恢复自己对整个地区施加影响、显示吸引力和实力的中心地位。正是在数百年的时间里，人们称这个国家为中央之国，并以此看待这个国家在“天下”的地位和它的居民。从上个世纪中叶开始，来自不同世界、不同地区的列强不时地践踏着这个古老帝国。内乱、革命、国内战争、外国扩张、政治割据以及毛泽东的社会经济试验持续不断地动摇着这个古老帝国的根基。从 20 世纪 80 年代初开始的经济腾飞，其领导人积极开展的对外政治活动，地区文化首领的权威，古老文明的光环，世界最大军队之存在和强化，使这个核心增添了原来的意义。

不久前，大部分学人、政客对中国能否复兴的怀疑已被断然排除了。很早出现但一直没有解决的问题重新成了关注的中心：这个国家将给人类带来什么呢？中国曾经是、现在也仍然是个谜。这个谜是另外一个文明的代表，无论是欧洲人、美国人，还是它的近邻都不能猜破。对于他们来说，无可争辩的只有一个，“亚洲的一切将取决于今天产生一个什么样式的中国”^①。由于经济和军事实力的增长，中国已成为东北亚发挥主导作用的角色，总而言之，无论是对地区的稳定，还是其邻居的政策和未来，包括俄罗斯远东，中国均能施以最大影响。这种实力、以及对自己力量的信心，使中国在传统的、固有的“中央之国”的自尊上，又膨胀了作为世界首领的自信，对自己

① 1994 年 1 月 31 日《日经指数周报》第 7 版。

的公正和绝对正确的信心。所以，中国在建立自己的国际关系的时候，总是令人想起中华帝国所固有的对世界格局和外交政策原则的理解。

在担心俄罗斯命运的时候，我们不能不考虑其邻国正发生什么事情。在想到我们国家东部边陲的未来的时候，我们实在应该考虑到伟大邻居的前景、目前和潜在的目标、利益、企图和需求。

同中国的贸易对于俄罗斯远东来说，究竟能有多大的好处呢？中国的投资对我们有什么利益并能产生何等不良后果呢？中国是否意味着军事威胁呢？如果是，那么究竟达到何种程度？究竟对谁构成威胁？中国向俄罗斯远东领土的扩张是否真的存在？谈论其潜在的扩张究竟有多少根据？这些问题以及其他问题不仅使政客、学者、企业家不安，也使所有远东人感到不安——显而易见，近十年来，他们习惯了中国人在自己城乡的街道上出没，习惯了他们的廉价商品、嘈杂的市场和并不缠人的服务。

看来，对于远东人来说，领土的划分是“中国问题”的核心。中国及其领导人并未正式向俄罗斯提出领土要求，在国家和中国利益的官方观点中，有关这个问题也没有任何说法。与此同时，中国当局和其居民又经常（私下）对沙皇俄国非法强占的阿穆尔^①沿岸地区、甚至萨哈林岛^②等土地表现出他们的眷恋。中国史学家们还在“沙俄侵华史”领域内积极耕耘。中国的中小学一如既往地按照标有沙俄侵占中国领土的地图进行教学。目前，中国的剧院上演一些戏剧，电影制片厂摄制一些影片，其目的仅仅是呼唤对“大北方^③处女地”进行经济开发，大部分中国居民还深信，俄罗斯远东的整个南部历史上属于中国。

尽管 90 年代初中俄关系有了很大的进步，但远东地区的俄罗斯居民，并没有感到边界局势有什么安宁。不等价的边境贸易，有利于中国的边界划分，大量中国人涌入俄罗斯，使远东人对北京的秘密意图产生怀疑。两个相邻国家 5 年来的紧密关系中重新显现了地缘政治利益的冲突，也显现了两种文明微弱的相容性。公正地说，在很小的程度上，这种相容性正是这两种文

① 阿穆尔，即黑龙江。——译者注

② 萨哈林岛，即库岛。——译者注

③ 大北方，应读做西伯利亚。——译者注

明冲突的派生物。

在这种背景下，中央，可以说是当局对远东边陲所表现出来的冷漠至少可以说是不负责任的。这种不负责任还表现在：它只是用简单而通行的口号轻描淡写地宣扬一下远东对俄罗斯的作用和意义。其实，远东各边区州同中国的关系要比简单的同相邻地区的相互关系更重大得多。这种关系应该从确定俄罗斯在未来世界的地缘政治空间、首先是它在东半球的作用和地位这一角度来审视。

东北亚正经受着一个重新评价各民族的价值观、改变其固定国际交往方式和模式的复杂时期，这也是一个扩大和加深经济合作关系的客观发展进程的时期。这一进程，迫使东北亚各国在未来该地区的所有发展规划中要考虑俄罗斯的地缘和军事（包括核力量）存在因素，以及西伯利亚和远东的经济潜力，尽管这些国家由于历史的原因并未把俄罗斯视为东亚国家和平等伙伴。

今天，俄罗斯只是消极自发地对日新月异的太平洋地区的呼唤做出反应；无疑，太平洋地区愿意对俄罗斯的西伯利亚和远东进行“和平的殖民开拓”。但是，从当代地缘政治的理论和世界各种文明互相影响的实践观点来看，这种召唤是最严肃的，因为正是要由俄罗斯的抉择来决定，要么仍然是海上强国，要么蜷缩在彼得大帝以前的罗斯的规模上。目前，在俄罗斯和东亚地区之间，已经形成了（请允许我在这里使用当代俄罗斯“文明人”的术语）一种非常强大的“压力落差”^①，它以不大令人愉快的后果威胁着俄罗斯。

第一，人口压力。现在通常列入东北亚（俄罗斯远东^②，中国东北，日本，朝鲜半岛）的土地面积略小于450万平方公里，人口超过3亿。这一地区的平均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65人，各不同区域的人口密度完全不同。

本地区有人口过密的日本和韩国（人口密度分别为每平方公里329人和433人），人口稠密的北朝鲜和满洲（每平方公里平均为175人和123人），

① 帕纳林：《俄罗斯在欧亚大陆：地缘政治的呼唤与文明的回应》，载于《文明与文化》第2卷；《俄罗斯与东方：文化关系》，莫斯科1995年版，第64—65页。

② 我把滨海边疆区、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阿穆尔州、萨哈林州、堪察加州、马加丹州和楚科奇列入了这一地区。

还有巨大的空旷的俄罗斯远东。即使在俄罗斯整个远东居民最为稠密的滨海地区，其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也不足 14 人。在东北亚地区，人口稳定增长，但俄罗斯远东除外，从 1991 年起，俄远东人口数量一直下降，地区人口之不平衡相当严重。

第二，技术上的落差。老化的能源高消耗技术事实上已 10 年没有进行更新，所以远东和西伯利亚不只是成了美国、日本、南韩三国技术的扩张对象，而且也成了中国技术的扩张对象。

第三，我们发现了今天在精神上、思想上的落差。在俄罗斯，构造社会的众多精神网线已经断裂，人们已经尖锐地感觉到了全民族思想的匮乏。相当多的人迷失了方向。当一些知道自己想达到何种目的、有稳定的固有文化的代表（很显然，中国人、日本人和朝鲜人正是属于这种文化），同某些在精神上迷途的人相撞时，很容易预见他们相冲撞的后果如何。无疑，俄罗斯同远东文明不顾一切的接近，不仅对本地区自己的民族利益和文化独特性造成危险，而且对远东的斯拉夫居民也潜藏着极大威胁。隐藏在太平洋地区、自然地针对俄罗斯的危险在于：不仅使俄罗斯的远东、西伯利亚在亚太地区的经济一体化中变成高度发展的太平洋经济的原料附庸，还会使其在其他文化——无论是正统的东亚文化、还是大众的美国文化——面前投降。

到目前为止，俄罗斯的东北亚政策还没有很好地确定和反映东亚现实存在的状况、本地区各方所代表的地缘政治利益、经济利益和领土利益。这种政策是在传统的大国立场上建立的，旨在捍卫俄罗斯在太平洋地区形成的模糊不清的“民族利益”，这种利益很难同远东地方的需求保持协调。

90 年代，俄罗斯远东地区在东亚的政策和对华政策，既是俄罗斯对外政策的组成部分，同时又是振兴中的俄罗斯艰难地寻找自己的位置和道路的内容之一。俄中关系在地区层次上的复杂经验，参与这种关系的地方当局立场和政策特点，是我研究的目的和对象。

在本书中，我力求避免绝对的判断和结论。世界发生的变化如此复杂和多彩，渴望对此作出阐释、并按照自己的方式去进行解读的当代人又是如此的急切和主观，以致对我们目前蓬勃的生活的实质和后果都不能形成一个统一的、无可争议的意见。读者有权知道各位作者的意见进而对之加以比较，以得出自己的结论。因此，我多次引用国内外同行，特别是那些专门研究世

界和地区政治、经济、人口、安全以及国际关系某些问题的学者的著作。尽管我绝对不同意某些人的观点，但他们都为本书作出了贡献。

同时，对于当代研究者来说，非常不容易的是，他们的研究要越过胡乱堆积的虚假报道的障碍，这些东西是那些极端的挟私者、政治上受聘的研究者（无论是专业人员还是方志爱好者）和记者围绕 90 年代中俄关系的个别方面搞出来的。可以想象，未来的历史学家要寻出真理，“从莠草中分出谷物”是何等困难。因此，我尽力最大限度地、完整地介绍远东的思想和政治环境，这种环境似乎就是这些关系的背景。当然，历史最终将使一切事物按其应有的地位去放置，去评判，谁是对的、谁富有远见卓识、谁确实误入歧途、谁只是满足于表面的判断、谁执行了“社会的订购”并把他人引入迷路，当代人同样应该更好地了解自己的“主角”。

在发表自己对时事的“跟踪”研究成果时，我认为，对它的反映将不会一致。我预见到，将会有来自权威人士对我的责怪和相当尖刻的攻讦，原因是这些权威人士在本书中没有得到好的评价。上天见证，我不想得罪任何人，极力不挟私见，认真对待这些人写出的意见。“长得丑别怪镜子”，我记起了这句俄罗斯谚语。如果某人的话和思想被受命描述俄中关系情节的记者予以不正确的理解和阐释，那又是谁的不幸呢？

无论如何，本书是描写一个时代的断面，这是一个充满急剧变化和历史转折的时代。我非常希望本书所提供的近十年的俄中两国地区间合作的经验不但有助于普通读者，而且有助于俄罗斯政治精英对形势有更加现实的认识，从而能够制定出与这种形势相适应的俄罗斯在东亚的内外政策。

历史文献

区域层次上的当代俄中关系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尽管如此，其中已经出现了若干不能不提起的令人感到新奇的倾向和立场。考虑到对该课题的学术研究为数不多，而且又具有相当普通的“试射”性质，根据学人们认识和分析这一问题的观点，我冒昧地将其分为三类。前两类的代表是俄中两国学者，他们是从各自国家的民族利益的角度来研究两国关系的，不可避免地带有偏见。第三类是外国专家，他们在了解本地区的局势、掌握具体事实和细节方面要差些，但他们的评论更具有客观性和批判精神。

俄罗斯学者著作的内容和特征一方面反映了俄罗斯内部政治局势的不稳定性以及 80—90 年代苏中关系的内容和 90 年代初俄罗斯对外政策的巨大变化；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在研究领域，特别是俄中关系预测方面，俄罗斯缺少卓越的能鲜明表达其思想的公认权威。90 年代，在俄罗斯大多数专门论述俄中现阶段关系的一般性著作中，关于俄罗斯远东在这种关系中的作用和地位，表述得既简要又概括。当然，同本地区有着直接关系的边界划分、中国移民、边境贸易等问题都提到了、分析了、评价了，但这多半都是从全球政治和“最高利益”的角度，在“欧洲中心”的框架内（莫斯科的中国学同行将会原谅我的这一见解）从脱离实际的学究立场行事的。

卡内基基金会出版的专门研究当代俄中关系的杂志《赞成与反对》、《莫斯科—北京》^①，可以成为这样的样板。该编辑部邀请的作者们有相同的意见：必须制定俄罗斯远东政策的战略，俄罗斯的民族利益以及西伯利亚和远东的发展应该是这一战略的基础。但是，在许多原则问题上（诸如来自中国对俄罗斯的威胁，双方军事技术合作的实效和后果，两国相互关系的前景

① 《赞成与反对》1998 年冬第 1 期（第 3 卷）。

及其他问题)，他们的立场有着重大分歧。在专家中存在如此深刻分歧的情况下，又怎能搞出统一的战略呢？

本书的读者也应该注意到我援引其著作的某些俄罗斯中国学家对俄中关系所持立场的特点。

A. 雅科夫列夫是从“超发展中心，即西方国家与其外围（它由其生存条件而定，实质上是所有落后国家）”之间全球对抗的立场研究当代俄中关系及其前景的。他认为，中国是外围国家潜在的首领^①。A. 沃斯科列先斯基^②也从全球立场评价俄中关系的前景。尽管他也指望在最近的未来两国无论国家关系、还是经济关系都将“相对和谐”地发展，但他也明确地表述了“俄罗斯的远东有被正在极力积蓄力量的亚洲邻居吞噬”^③的潜在危险。

M. 季塔连科^④把重点放在制定两国经贸关系的发展战略上，在“两国国民经济综合体高度互补”的思路中研究远东地区参加俄中经济合作的前景。令人忧伤的是，他早在 90 年代初就已建议过的关于俄罗斯对中国关系的原则立场、关于提高两国关系效率的途径和办法直到今天也没有实现。

在 20 世纪 90 年代从不同角度专门论述俄远东地区同亚洲邻居关系的不太多的著作中，唯一一本大部头著作就是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集体编写的《俄罗斯远东与东北亚》^⑤。本书的作者们从探寻“俄罗斯远东参加东北亚双边、多边经贸关系和世界经济联系与亚太地区一体化的广阔环境”的最佳方案的角度，从探求使俄罗斯权力机构关注必须“制定新的远东人口定居模式和为国内外投资者建立良好的投资环境”^⑥的最佳方案的角度，研究本地区与相邻国家的经济关系、本地区一体化和流动进程。从地区层次上研究俄中关系的著述还有 H. 科诺科娃的副博士论文和几篇篇幅不大的论文及 A.

① 莫斯科《远东研究所通报》1995 年第 3 期和 1996 年第 13 期。

② 沃斯科列先斯基：《西风还是东风？美、俄、中与世界领袖》，载于《自由思想》1996 年第 10 期；《俄罗斯对外战略中的中国问题》，载于《自由思想》1996 年第 1 期。

③ 沃斯科列先斯基：《西风还是东风？美、俄、中与世界领袖》，载于《自由思想》1996 年第 10 期第 105 页。

④ 季塔连科：《俄罗斯与东亚——国际关系与各种文明之间的关系问题》，莫斯科 1996 年版，第 119—154 页。

⑤ 《俄罗斯与东北亚——经济合作问题》，莫斯科 1998 年版，第 248 页。

⑥ 《俄罗斯与东北亚——经济合作问题》，第 7 页。

拉济金和 Ю. 莫斯卡连科发表的一些成果^①。

围绕俄中边界东段划界问题，在俄罗斯政治圈内燃起的情绪又被某些传媒积极炒作，由此也引出了一批在不同程度上专门论述俄中边界划分历史的学术著作。其中，米亚斯尼科夫的专著《俄中边界外交史（17—20 世纪）》^②是最重要的力作之一。该书向学者和新闻工作者所介绍的内容，对于他们写好划界问题的文章并非多余。作者从俄罗斯与明朝地理上的接近开始叙述，一直到 1991 年苏中东段条约的签订。该书以大量历史文件为依据，对俄罗斯在急剧变化的东亚地区的历史作用和地位进行了多年研究和认真思考。俄中关系的经验，中国当代发展的历史和趋势，使 B. 米亚斯尼科夫得出了以下结论：俄罗斯在远东的利益受到了快速发展的邻居的实际威胁，俄罗斯迫切需要转向东方的政策，尤其是对东北亚的政策，并尽快制定发展远东领土的战略，这些结论绝非偶然所得。^③

经济学家 B. 特卡钦科^④以另一种方式，通过评价俄罗斯的经济、领土损失研究当代划界问题。他毫不掩饰地搜寻那些能使俄国拒绝把滨海和阿穆尔的部分土地交给中国（这已由 1991 年的《关于俄中边界东段划界的协议》确定）的历史和法律依据。他认为，俄方的让步没有根据，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批准这个文件是不合法的，它不符合俄罗斯宪法。

第三个问题是，90 年代初曾在所有人中传言的在俄罗斯领土上“中国人口的扩张”也成了 B. 波尔加科夫、И. 科米西娜^⑤和其他一些研究者研究的对象。其中部分人（如 И. 科米西娜）是透过俄罗斯的快速“中国化”去审视问题的，另一些人（如 B. 波尔加科夫）则把中国人的渗透视为一个客

① 《远东问题》1994 年第 5 期、1996 年第 1 期。

② 米亚斯尼科夫：《俄中边界外交史（17—20 世纪）》，莫斯科 1996 年版，第 482 页。

③ 《俄中边界外交史（17—20 世纪）》，第 410—425 页。

④ 特卡钦科：《俄罗斯远东对外政策的效果问题》，符拉迪沃斯托克 1996 年版，第 95—125 页。

⑤ 波尔季亚科夫：《70 年代末—90 年代初中国探索社会经济发展之路》，载于《远东研究所通报》1995 年第 12 期（第 3 卷）第 180—190 页；《中国人来了？——谈远东的人口流动状况》，载于《国际生活》1996 年第 2 期；科米西娜：《中国劳动力向俄罗斯的输出问题》，载于《新欧亚——俄罗斯与邻国关系问题》1996 年第 5 期。

观的过程，只是需要俄罗斯采取积极的调整措施。B. 波尔加科夫总的建议是：“医治中国战略规划中任何扩张的良药，是建立一个经济强大的俄罗斯”，必须采取有力措施，在俄中边境地区增加俄罗斯的人口，并最大限度地使那里的经济生活国际化，不应放任两国人民在民族心理上的对立升级，应该寻求“文明推动力来促进同中国移民的相互关系”。这些建议显然是对联邦和地方当局说的。B. 波尔加科夫的建议是正确的，但并非新奇独创。早在一百年前有识之士就多次提过这一俄国在远东牢固立足的主要手段，但没有什么特别效果。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提到的 M. 季塔连科、B. 米亚斯尼科夫和 B. 波尔加科夫乃是远东研究所的领导，在克里姆林宫、国家杜马和外交部均有一定影响，并能够影响到俄罗斯对华政策的制定。而最重要的则是研究这些学者们引人入胜的建议在实践中的体现。实际情况证明，俄罗斯的政治家和官僚对俄中关系问题及解决问题的方法，有他们自己的观点，远不总是同中国问题专家们的观点相吻合。媒体上出现的来自俄罗斯高层的一些文件，以及对高层分析、解决问题和采取的行动的意见，本身就是非常有意思的研究课题。我并不把中央和地方（尤其是地方的）有关中国和“中国问题”的大量文章都视为历史文献，尽管其中有些文章追求科学方法；政论家的冲动和追逐轰动效应明显地压倒了严肃的科学分析，揭露“中国扩张”的热望压倒了对客观性的追求。

出自俄罗斯外交人员笔下的文章是“科学研究成果”的特殊一类^①。正如我曾表述的那样，关于俄罗斯远东在俄罗斯价值体系中的作用和地位的观念，也是在斯摩棱斯克广场^②占统治地位的观念^③。很显然，理解并评价外交家们公布的东西，不应像对待科学研究成果那样，而应将其视为俄罗斯外

① 阿法纳西耶夫、罗格维诺夫：《世纪之交的俄罗斯与中国》，载于《国际生活》1995年第11—12期；卡拉辛：《俄中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前景》，载于《远东问题》1997年第2期；拉赫马宁：《战略协作之路上的俄中两国》，载于《远东问题》1997年第1期。

② 斯摩棱斯克广场，即俄外交部所在地。——译者注

③ 拉林：《世纪之交的俄罗斯与中国——谁将捍卫我们的民族利益？》，载于《远东问题》1997年第1期。

交部门的宣传、解释说明文件。

最终，还不能不就俄罗斯的“地缘政治家们”关于亚太地区或东亚的预测成果说上几句。在这些著述中，俄中关系的前景必须在即将到来的几十年里去观察，俄罗斯远东的未来也必须在此基础上研讨。这些专家只是从全球范畴去思考，他们使用的资料来源非常有限，实际上忽视了地区的资料。以 P. 阿利耶夫（使用笔名 O. 阿林）和 A. 博加图罗夫的最新专著为例^①，他们大部分依据美国政论家的同样的著作，得出了有关未来俄中关系的对立的结论。远东的题目在这些著述中阐述得非常肤浅，因为在论及俄罗斯远东的当代地位时，作者主要根据的是偶然挑选到的某些美国或西欧的成果来判定的，他们宁肯通过美国人 J. 斯特凡的著述重构远东的过去（包括评论俄罗斯历史上远东的地位和作用）^②。P. 阿利耶夫总结说，俄中战略结盟是不可避免的；A. 博加图罗夫也说，两国的地缘政治角逐同样会是必然的。

之所以如此，大概不只是由于对“偏远的地方学术”持鄙视态度的绅士作风，甚至还有对远远冲在前面的西方政治学的不自觉的崇拜。这正是俄罗斯远东无论在其地缘政治中、还是在地缘政治和国际关系研究中的凄婉所在。那些出自远东高校的教员，以及急于从科学共产主义专家变成政论家和国际问题专家的人们，其笔下关于东亚的时局与国际关系方面的不成熟的时评，就像他们的创作室远离目前世界和地区地缘政治中心一样远离实际。

因为俄中关系在地区层次上出现了（诸如边界调整、人口流动、一体化趋势等）一系列对当代世界和国际政治来说都是非常紧迫的问题，所以这些问题本身也引起了世界上其它地方关心并探求解决类似问题方法的学者们的兴趣。如 1994 年在美国亚特兰大，由佐治亚理工学院“国际战略、技术和政治研究中心”组织的“中国人移居俄罗斯远东”问题的讨论会就是其具体的结果。这些发起者们认为，俄中边界的情况在许多方面与美国同墨西哥边界的状况相似：在这两种情况下，都是穷国的许多居民把较富裕的北方邻居视为一种经济上的发展机会。

① 阿林：《亚太地区：神话幻想与现实》，莫斯科 1997 年版；博加图罗夫：《太平洋上的大国》，莫斯科 1997 年版。

② 斯捷潘·约翰：《俄罗斯在远东》，载于《历史》，斯坦福大学出版社 1994 年版。

另一方面，在“西方”产生的有关潜在的俄中军事和政治结盟会使国际舞台力量对比发生严重变化的威胁的担心，刺激了对此感兴趣的各国政府针对当代俄中关系研究这一科学领域进行固定的专项（作为对研究的各项保障）投资。结果，许多美国、欧洲和日本的东方学家和斯拉夫学家，无论是在世界学坛极富经验的知名人士，还是年轻学人，都被吸纳到这个问题的研究之中。由于他们所拥有的资料非常有限，对所研究对象的认识也很粗略（不但因为俄罗斯大部分远东地区 and 中国的东北对外国人长期封闭，而且也由于研究问题的时间有限），所以，他们的议论和结论常常很宽泛，缺乏深度。但最为可贵之处在于，研究者们是从旁观者的立场看问题的，在某种程度上他们是不偏私的。这些研究成果大都是在各种学术讨论会上的学术报告，其中一部分公开发表。这些问题在两次学术会议上得到了相当详实的研究和分析，这两次会议是：1993年12月在普林斯顿和1995年在哈巴罗夫斯克由普林斯顿大学教授C. 科特金和Д. 沃尔弗组织的“西伯利亚、俄罗斯远东和东北亚：过去和现在”学术会议。

先将一系列分析整个俄中关系的外国出版物搁置一旁，因为地区问题在这些出版物中只是作为衬景出现的。数量不大的直接针对地区层次相互关系的研究成果可假定分为两类。第一类中包括了沿东段边界俄中关系全部综合研究的著作，第二类则包括了首先是与中国移民相关的具体相互关系的研究成果。

在一般性的研究成果中，首先应指出的是Г. 罗兹曼的文章，他把俄中两国的接近视为东北亚区域主义和区域一体化的形成趋势，而J. 莫利茨则强调当地的俄罗斯因素对两国和人民之间关系发展的积极影响。^① Э. 海耶尔向亚特兰大学术会议提交了饶有趣味的报告——“中国和俄罗斯远东的亚洲化”，题目就引人入胜。作者总结说，“为了使该地区成为繁荣的地区，它应该经受一定程度的亚洲化”。^② 我并非不接受作者认识问题的独创性，但我还是要指出，类似的思想B. 波尔加科夫已经说出来了，他认为，“对于远东来

① 罗兹曼：《俄中边界的天然走向》，载于《在亚洲的俄罗斯人的再发现》，见科特金与沃尔弗编：《西伯利亚与俄罗斯远东》，伦敦1995年版；莫利茨：《俄中再次接近过程中的地区紧张》，载于《亚洲概览》第35卷，1995年6月号。

② 海耶尔：《当代东西伯利亚的中国移民问题》，1994年12月亚特兰大会议论文。

说,要使其成为真正发达的俄罗斯地区,在民族成分构成上应该少一些俄罗斯人”。^①

研究“冷战”以后俄中关系的一些为数不多的日本出版物也属此类。这个研究集体是在岩下明裕(音译)的领导下为“发展地区和国际合作”计划而工作的。这个计划是在1992—1996年在北海道大学斯拉夫中心领导下实施的,主旨是认真研究远东媒体所发表的东西。用中日文出版的报告“从俄罗斯远东看中国(1992—1996)”^②是其工作总结。报告的前言指出,这是“日中学者对俄罗斯共同研究”的成果。作者们提出了地区相互关系的关键问题:中国人的流动、划界、经贸关系等,这些问题是边界地区的报章提出的问题。在此基础上跟踪研究三个边界地区——滨海边疆区、哈巴罗夫斯克边区和阿穆尔州当局对华态度的区别。岩下的文章则重点强调了后一个问题^③。作者断言,这几个与中国相邻的俄罗斯边区当局在对华政策上有歧异,这首先是由于经济前提的不同,亦即他们与中国相邻省份在经济关系上的利益不尽相同。他还从沿俄罗斯边界地区不稳定因素的增长看出了对发展两国关系的最大威胁。

俄中两国在地区层次上相互关系的重要问题——边境贸易、中国移民、划界——成了外国学者专门研究的课题。美国学者Э. 维什尼克在前述哈巴罗夫斯克的学术会议上,根据俄中地方资料作了一个90年代初俄中边境贸易的详细报告。^④她对滨海边疆区同黑龙江省的关系格外注意。按照她的观点,两个相邻地区的关系促进了它们经济状况的改善,但俄罗斯远东与中国东北未来的合作将完全取决于双方中每一方经济改革的成就。

研究20世纪90年代初俄中关系的每一个作者都不同程度地涉及了中国人向俄罗斯领土流动的问题,但国外专门研究这一问题的是极少数人。在

① 波尔季亚科夫:《中国人来了?——谈远东的人口流动状况》,载于《国际生活》1996年第2期第86页。

② 《从俄罗斯远东看中国(1992—1996)》,载于《斯拉夫研究中心》1998年1月(第53期),札幌。

③ 岩下明裕:《后冷战时期的俄中关系:斯拉夫-欧亚世界变迁中的社会变化趋势》,载于1997年1月30日《1997年1月30日—2月1日斯拉夫研究中心冬季讨论会记录》,札幌。

④ 维什尼克:《目前中俄边贸的新问题》(内部材料)。